

旦园枫红

复旦大学退休教职工管理委员会
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协会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旦园枫红/复旦大学退休教职工管理委员会，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协会编/上海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ISBN： 7-309-03781-2

价格： 22.00

编委会主任 彭裕文

编委会副主任 方林虎 沈文龙

主 编 方林虎 沈文龙

执行主编 陆士清 袁震宇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林虎	王新民	王蕙仁	孙云媛	陈 勤
陆士清	沈文龙	余赛妹	郑天心	金文英
金邦秋	孟祥生	胡荣生	徐志伟	唐尚明
袁震宇	黄全娣	黄建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生动地讲述了一批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夕阳似金的生活和老有所为的精神风采。

他们或退而不休,或离而不休,继续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他们中有的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有的进行科技项目攻关;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有的参与社区公益事业;有的从事老龄工作为老服务等等。

他们把自己从事的事业视为生命,孜孜不倦地追求,默默无闻地奉献。硕果累累,层出不穷,为复旦大学不断争得新的荣誉,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他们的事迹是感人的,他们的精神境界是高尚的。他们是我们青年人学习的楷模。

他们给我们以启迪,退离休教职工乃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要珍惜!

夕 阳 似 金

——《旦园枫红》序

彭裕文

正当复旦大学广大师生员工为迎接百年校庆,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满怀豪情,艰苦奋斗的时刻,由复旦大学退休教职工管理委员会和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协会合编的《旦园枫红——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老有所为”纪实》一书与大家见面了。

这本纪实性散文集,共有 77 篇短文,其中 55 篇来自邯郸校区,22 篇来自枫林校区。很有意思的是,这些短文排列的顺序,是按照文章所介绍的退离休老教师的年龄。第一篇介绍的是“年龄有老学无老,健在不休死后休”,今年 98 岁高龄,已经退休 17 年,曾经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的德高望重的蔡尚思老先生感人的晚年学术生涯;而排在最后的第 77 篇,则歌颂了在今年抗 SARS 的斗争中,“阻隔危险,传递关爱”的复旦大学非典隔离区负责人李德容老师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李德容老师今年才 56 岁,去年 5 月刚刚退休,是退离休教师中的小妹妹。

全书生动反映了复旦大学广大退离休教师,退而不休、离而不休,把自己从事的事业视为生命,毕生孜孜不倦的追求;介绍了他们在退离休以后,继续“老有所为”,继续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继续推动国家和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和精神风采。

2002 年 9 月的一天,复旦大学退管会的沈文龙同志给我转来了一份署名“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协会”三易其稿才完成的题

为《夕阳仍辉煌——关于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老有所为”情况调查》(即本书的代序二)的文章。我一口气读完了全文。原来,复旦大学许多退离休老教师离职不离岗,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关心下一代和社区公共公益事业等方面,依然在默默地无私奉献,新的硕果层出不穷,为复旦大学不断争得新的荣誉。我知道,复旦大学目前已经有退离休教职工 3 000 名,近年来,每年还有近二百名教职工加入退离休队伍,其中,不乏精神境界高尚、又有真才实学之士。他们在职的时候勤奋工作,是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有功之臣,没有他们就没有复旦的今天;退离休以后还在继续默默奉献着硕果,真正显示出他们是学校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宝贵财富!在他们身上闪耀的,不正是复旦百年校庆要好好总结和大大发扬的复旦精神吗?这种精神的发扬和光大,一定会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

于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份情况调查转给秦绍德书记和其他学校领导,让大家对复旦退离休老同志的“老有所为”情况有更深刻和具体的了解;第二件事是转给学校的宣传部门、校刊,希望他们满怀热情地去深入采访和大力宣传。

沈文龙同志进一步提议,能否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一本反映复旦退离休教师“老有所为”丰硕成果和伟大精神的纪实性散文集呢?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协会理事长、原复旦大学副校长方林虎教授当即表示大力支持。于是,编委会迅速组成,编委和退教协的理事们与两个校区许多退离休老教师们,都积极热情地忙碌起来,投入了此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他们不管年老体弱,不管还有许多不得不亲自忙碌和操心的事,人人怀着一颗热情跳动的童心,夜以继日认真地工作着。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今年抗 SARS、战高温的日子里,他们都没有停止一天。在本书终于与读者见面的时刻,我向全体作者和本书的编委,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祝贺!

在本书所描述的一个个老教授们面前,我是一个晚辈。阅读了本书以后,我首先为我们的老前辈们“宝刀未老”,在退离休以后的日子里,还作出了如此辉煌的成果而感到喜悦和骄傲。98岁的蔡尚思老人,耄耋之年还挤公共汽车去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完成了《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和《中国礼教思想史》等重要学术著作;96岁的我国法医界老前辈陈康颐教授,鞠躬尽瘁,奋斗不息,1995年以来竟然陆续出版了《应用法医学总论》、《应用法医学各论》和《现代法医学》等三大部我国法医学的最新著作;还有许多老教师继续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研究生,继续潜心于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全身心投入关心下一代和公益事业……真是“夕阳无限好,晚霞灿若虹”。

我还深深地感到,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尚和伟大的精神,比起他们在退离休以后做出的辉煌成果,更加令人震撼和感动,更加值得我们光大和发扬。我想,这大概就是世世代代传下来,又一定会世世代代传下去的复旦精神吧!

通读全书,在这些老教师身上,最集中表现出来的,我看有四种精神:

一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中文系的贾植芳教授,早年投身革命,但一生坎坷。尤其是胡风事件,使他受尽委屈和打击。平反以后,他努力工作,无怨无悔。近十年中,奋发著述,出版回忆录、专著和教材十余部。2002年5月,他获得了“上海市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提名奖”。他深情地说:“鲁迅和胡风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一生的成就也无非就是做到了像他们那样,把一个‘人’字写得还算端正。”历经风雨的贾植芳教授一以贯之追求真理的精神和作为我党诤友的豁达心境,不能不使我深受感动。今年早春,“非典”突如其来爆发,首先在我国广东凶猛传播,不少患者和医务人员一个个相继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已经退休十年的我校公共卫生学院李子华教授,突然在家里接到国家卫生部领导亲自从

广州打来的电话。因为在衣原体研究方面,他是我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电话要求他立即赶往广州,参加关于“非典”病原体的重要讨论。当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已经公开发布信息: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认为“非典的病原体基本可以肯定是衣原体”。李子华教授想,目前已知的三种致病的衣原体即使引起肺炎都有症状不重、抗菌素治疗效果非常好和不会使人致死等特点。于是,他明确表态:衣原体不可能是这次非典的元凶,我们应该从病毒的方向去寻找真正的病原体。后来的事实应验了他的观点。

二是艰苦奋斗、挑战困难的精神。我们的离退休老教师大部分都是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走来,家境一般都不宽裕,有的还相当困难。但是,他们视事业为生命,艰苦奋斗,锲而不舍。如管理学院的徐业基老师,老伴卧病,儿子残疾,本人患有全身性银屑病,其痒难忍,家庭经济也相当困难,真可谓是贫病交加。然而,在李大潜院士和管理学院领导的热情帮助下,他追求事业的意志不衰,坚持从事管理预测理论的研究,在核心期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他说:“我要像写电视剧一样,一集一集写下去,使预测理论系列化、完整化。”我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女教授陆培廉,身患高血压、乳腺癌、腰背痛和轻度脑梗塞等多种疾病,她老伴又三次中风,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惟一可以依靠的女儿,又患乳腺癌而动手术。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曾使她陷入苦闷和彷徨。但是,她没有被压倒,没有在困难面前屈服。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她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充实生活,参与教研室的许多工作,参与编写、审阅和审校了不少教材和著作。在奉献中她忘却了烦恼和痛苦;在对事业的追求中,她达到了心理的重新平衡。

三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退休已经 15 年的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蒋学模老先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前后共修订了 12 版,发行超过了一千八百万册。每次修订的过程,就是他不

断坚持和追求真理,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不怕守旧,二不能守旧。”“有人喜新厌旧,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旧’抛弃,我一定要坚持,决不动摇;但是,我们又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僵死的教条,对于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过时的传统观点,我们一定要抛弃,代之以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他还自豪地说:“有人自称是‘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是‘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93岁的顾学箕教授,从进入医学院读书之日起,就立下了“一生为人群服务”的远大志愿。1987年退休以后,坚持实践自己的志愿,继续在预防医学教育和职业卫生领域辛勤耕耘,不断开新花、结硕果。国家卫生部在2000年授予他“全国职业卫生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高分子系的于同隐教授在70岁退休以后,又为高分子学科开辟了新的重要研究方向——生物大分子,而且在蚕丝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进展。张薰华教授今年82岁,还在指导博士生。60岁以后,他先后出版了九本专著,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他说,他的成果大多在60岁以后产生,“60岁还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离晚霞还早呢!”

四是胸怀宽广、无私奉献的精神。这在复旦大学离退休老同志中更是处处可以见到。姚桂根教授爱生如子、刘启鼎老师无微不至照顾老同志、林敏先生热情服务社区,为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老人们谁有困难,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热心于我校退教协工作的潘玲娣、袁震宇和王蕙仁等老同志。为了填补国内的空白,阮刚、汤庭鳌、章倩苓和包宗明四位教授在退休后,共同翻译出版了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萨支唐教授的《固态电子学基础》一书。萨支唐教授激动地发来电子邮件:“知道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这个中译本是属于平均年龄66岁的你们四人的。多么了不起啊!”还说:“应该将此告诉年轻人,你们是年轻人的榜样。”萨支唐教授说得真好,我们一定要发扬复旦大学

退离休老同志胸怀宽广、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我们的青年教师和广大学生,更加奋发有为地投身于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复旦大学的广大退离休老同志为什么能这样奋发向上,积极有为?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长期教育下,他们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看到复旦大学的绝大多数老同志衣食无虞,有了困难也可以得到社会和学校应有的帮助。他们深深地感到,躬逢盛世,应该把自己的晚年,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投入到毕生热爱和为之奋斗的事业中去。只有“老有所为”,才有“老有所乐”。复旦大学党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老龄工作政策,复旦大学退管会的同志们和各基层单位都认真、全面地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确定的“六个老有”的正确方针,也帮助复旦大学的老同志们创造了能够“老有所为”的条件。当然,老同志们高尚的奉献精神是首要的。

今后,在复旦大学的退离休工作中,我们应该更加努力落实好“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面理解和执行好“六个老有”的正确方针和党的老龄工作政策,为复旦大学老同志们的“老有所为”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我们也深切地希望,退离休老同志的“老有所为”,一定要量力而行,老同志们第一位的任务是健康长寿。

最后,衷心祝愿复旦大学的退离休老同志们健康长寿,老有所为,生活愉快,晚年幸福!

夕阳仍辉煌(代序二)

——关于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老有所为”情况调查 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协会

为了配合校退管会进一步做好退管工作,进一步落实退离休人员的“六个老有”,我们对全校退离休教师最近两年“老有所为”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

我们的调研工作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的,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普遍发动,全面调查。3月中旬,根据理事会的要求,各基层小组通过发放调查表,或逐个询问,对会员的“老有所为”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其中491名会员对调查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占会员总人数的42%),40个小组提出了详略不同的报告。

第二阶段,召开“老有所为”的专题研讨会。4月11日,我们在浙江长兴召开理事扩大会议。会上,副理事长袁震宇报告了第一阶段的调查情况。会议围绕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将近20位会员发了言。涉及的内容有:11 关于“老有所为”内涵的理解问题;21 “老有所为”与学校和社会事业需要的关系;31 “老有所为”与退离休教师献身事业、实现自我价值和精神健康需要的关系;41 进一步鼓励和支持“老有所为”尚需注意和解决的问题等等。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大型调研会,也是一次对“老有所为”问题加深认识的会议。

第三阶段,重点深入,解剖典型。9月份开始,我们选择了生命科学学院、经济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等三个单位作为重点,由理

事长方林虎带队,与各学院退教协小组召开座谈会,先后共有二十多位教授出席了座谈会。三个单位的党总支书记、副书记也亲临会议,与大家亲切座谈交流。会上,大家就退离休教师“老有所为”的相关情况以及开发退离休教师智力资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我们觉得,经过三个阶段的调研,大体摸清了全校退离休教师“老有所为”的基本情况,现报告如下。

一、离职不离岗 夕阳仍辉煌

离职不离岗,夕阳仍辉煌。可以说这是我校退离休教师“老有所为”的形象描绘。我们现有会员 1 167 名,他们都具有副教授以上的高级职称,或曾担任处级以上领导职务。他们中有的曾是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骨干,有的是学有专长的专家,有的是在各自学科领域中深具影响的资深教授。他们虽然退下来了,但仍然在“老有所为”,积极奉献。据对 491 名会员的不完全统计,退离休教师们至今仍在教学、科研、关心下一代和社会公益等四个方面参与学校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其中为本校本科生上课的有 75 人,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有 65 人,指导博士研究生(包括博士后工作站)的有 37 人,为各类学校和培训班讲课的有 169 人。即 491 名退休教师中继续从事教学工作的有 342 人,占 70%。一些老教授至今依然承担着繁重的指导博士生的任务。如经济学院的蒋学模,在 2001 年前,他每年都指导博士生九名(每个年级三名),另有四名老教授这两年指导博士生 45 名,博士后六名。哲学系潘富恩指导博士生八名,博士后二名,金顺尧指导博士生十名。中文系范晓指导博士生 17 名,其中五名为外国留学生,宗廷虎指导博士生七名。外文系陆国强指导博士生六名。政治系孙关宏指导博士生 15 名。微电子学系章倩苓指导硕士生 11 名,博士

生六名,博士后二名。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 14 位老教授指导 50 名博士生和一名博士后,有 16 位老教授指导 32 名硕士生。公共卫生学院的俞顺章与医学院的程介士指导培养的二名博士生,在 2001 年都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并各获专项资助资金 65 万元与 50 万元。

在科学研究方面,退休的文、理、医教授承担科研项目 144 个,获得经费一千多万元。化学系退休教授承担的课题项目获得了四百多万元的经费资助。最近,现代物理所汤家镛筹备和启动“电子束离子束”的一个项目,又获得 3 000 万元经费。生命科学学院郭杰炎 2000 年完成国家 863 科技重点项目,验收通过后,以 1 000 万元转让(入股)内蒙古金宇集团和复华实业集团。医学院陈惠黎、程介士主持两项国家重点研究课题,2001 年度验收总评为优。公共卫生学院的沈福民与美国福克斯·蔡司癌症研究中心协作研究“肝癌的病因、预防及遗传问题”,自 1993 年迄今,已进入第二期协作,他退休后仍然是该课题的负责人。在这两年中,俞顺章、朱惠刚、单易非、陈惠黎等四人,分别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或三等奖。俞顺章的研究成果“大肠菌及类大肠菌试验”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许多老教授退休以后笔耕不止。据不完全统计,这两年来,已出版各类专著 225 种,发表论文 634 篇。经济学院洪远朋从 1999 年以来,主编出版了四本《经济利益理论与实践》丛书,撰写主编出版《共同利益论》等三本专著,发表论文 12 篇。年过八旬的张薰华再版了《资本论脉络》,出版了新著《经济规律的探索》,发表了论文 11 篇。中文系王运熙、顾易生、袁震宇、濮之珍、潘旭澜,哲学系潘富恩,管理学院陆廷纲、王其藩、华宏鸣等都有一部或多部专著出版。85 岁的贾植芳依然笔耕不止,今年获得了“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提名奖”。生命科学学院的周德庆编著出版、待出版的著作有 12 部之多。物理系倪光炯与陈苏卿编著的研

究生教材《高等量子力学》，被同行认为是“新内容丰富，前沿内容精彩”的著作。医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老教授已出版专著 56 部，还有 12 部待出版。成令忠主编《组织学彩色图鉴》获 2001 年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他历时三年主编了 300 万字的《现代组织学》，并还在主持筹划由八个院校联合编著的新教材《组织胚胎学——人体发育组织学》。刘星楷在已出版的《中华本草》(1—10 卷本)和《中华本草精选》两部大型专著中任化学编委会主任编委。陈惠黎两年来发表论文 13 篇，其中十篇发表在影响因子为 1.7—2.9 的国际杂志上。程介士发表的 18 篇论文中，有十篇发表在国外 SCI 期刊上。

还有部分老教授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经验，参与社会的经济活动、科技开发和技术咨询、顾问等。如药学院金昭英加入了百嘉公司，这几年开发研制成了四个产品上市。一些退下来的党政干部，同样积极参与“老有所为”活动，原总务处长董嘉良、出版社副社长汤金年，创办上海高银科技开发公司十年，开发了不锈钢酸洗钝化膏和核磁共振谱仪等系列高新产品。

不少老教授应聘参与国家的法律、科技、医学事业的管理工作。管理学院王福新现任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咨询专家、上海市政府信息产业办立法咨询专家，生命科学学院郑师章现任中国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药学院郭济贤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副主任等等。

在关心下一代成长方面，退离休老教授们主动参加教学巡视督导，或开展“忘年交”活动。他们听课，检查教学、实验质量，用各种形式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在与青年教师和学生的真诚交往中，做到了“忘年结友谊，润物细无声”。在社会公益方面，有 225 人在各社会团体、学术、文艺团体、出版物和市政社区中担任了理事长、监事长、主编、编委等职。医学院有 43 位教授在 121 种刊物中兼职。公共卫生学院顾学箕，曾被国际权威杂志《职业卫生与

安全》称为“中国职业卫生之父”。退休后壮心不减,宝刀不老。90 高龄的他,在 2000 年获得了“全国职业卫生先进个人”的殊荣,是荣获这一称号的最年长者。

总之,退离休老教授依然在教学、科研、关心下一代和公共事业方面积极奉献,硕果累累,不仅促进了我校和国家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为复旦获得了荣誉。

二、事业需要我奉献 躬逢盛世任驰骋

在调研中,我们与各单位的领导以及许多老教授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些老教授在退离休后,仍然孜孜不倦地在教学科研方面作贡献,仍然热情地关心下一代和参与公益活动?大家共同的回答是:“事业需要我奉献,躬逢盛世任驰骋。”

事业需要激发了生命活力,许多老教授在教学科研事业上老当益壮。如经济学院因国家需要人才,招生规模逐年扩大,现有在校本科生 1 200 人,硕士生 1 100 人,博士生 300 人,而在职教师只有 84 人。本科生的教学和研究生指导任务的繁重是可想而知的。这样,一方面是繁重的任务促使学院领导设法在老教授中开发资源,返聘了 5 位博士生导师,请他们指导博士研究生;另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也激发了老教授们的工作热情。如张薰华 1991 年离休以后,一直耕耘在教学工作的第一线,现在仍然每年带三个年级的九位博士生。一位年过八旬的长者还在不知疲倦地工作,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这是事业的需要。作为教育工作者,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培养下一代。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具有智力。人类世代智力的扩展,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有人类美好的未来。”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老教授“老有所为”是为了增加一些经济收入吧?这样的看法似乎不无道理。确实,一些老教授退休早,收

入低,为了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部分报酬,完全是正当的、合理的;何况他们的付出远大于他们的获取。但是这不是我们老教授们的主要目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服务。如生命科学学院郭杰炎,退休八年来一直从事国家 863 项目的实验工作,领取的是返聘费。如果他换个单位搞实验,收入可以增加几倍;但是他不去,因为他认为这是事业需要。陈石根、周润琦和李致勋从事的是具有原创性的 FE 研究工作。他们做了 17 年,制成了十多个产品,申请了三项专利和一个药证,获得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发表论文四十多篇,撰写出版了《酶学》(69 万字)和《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解释》(120 万字)。在他们退休时,都想结束工作了,但是这项研究尚未有人能够接班,他们还只能坚持下去。对事业的责任感使得陈石根天天来实验室工作。又如,公共卫生学院沈福民从事“遗传流行病学”研究。这是个新兴交叉学科,在国内他起步早,做了二十多年。学科的性质决定了需要较多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研究它不仅要求把握学科本身,还要求有较高的外语水平。他自己一直想休息了;但心犹不甘,因为接班人还没有跟上来,事业要求他继续顶着。再如医学院的宣增镛,退休以后接受国家体育总局委任,继续担任国家跳水裁判委员会主任,并任上海市跳水协会副主席。2001 年主持筹办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大学生运动会跳水比赛,担任比赛现场执行裁判长。他的工作得到了国际游联、大体联和国家体育总局的充分肯定,在世界大赛的裁判工作中,为国争了光。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比赛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我两腿沉重,累得路都走不动了,但精神上非常愉快,一种成就感、满足感支持着我……我热爱跳水,热爱跳水裁判工作,它是我的事业,是我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只要国家需要,事业需要,只要我力所能及,我将继续做下去。”

“事业需要我奉献。”这就是我们老教授们的“老有所为”的精

神境界。

同时,退离休教授“老有所为”积极性的高涨,与躬逢盛世是分不开的。所谓盛世,就是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思想自由,学术民主。在这样的盛世里,老教授中除极少数困难者外,大多生活安定,衣食无虞。退下来后,一般身体还较健康,因而他们有时间、有精力继续在教学上发挥作用,或继续去完成他的研究工作。而且,社会的前进,经济的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会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要人们去面对,去研究和探讨。老教授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是思想者,即使退下来了,也不可能对生活中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新情况不加审视甚至无动于衷。他们必定要去思考探索,乃至给予回答。国政系朱文忠在谈到他主编出版《小城镇发展导论》时说:“20世纪90年代末,江总书记多次深入农村考察,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把发展小城镇提到‘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发展小城镇的重大战略意义。探索这一‘大战略’,就是推动我调查研究和写作的直接动因。”历史系97高龄的蔡尚思之所以能在2001年先后出版了《蔡尚思论文集》、《中国思想史研究法》等专著,医学院95岁高龄的陈康颐之所以能在2000年主编出版150万字《法医学总论》和《各论》后,又主编300万字的《法医学大全》,汤纲之所以修订再版合著的《明史》和二十五史新编《明史》,并合作主编约300万字的《明史辞典》等,也是因为躬逢盛世可在学术领域任我驰骋。

盛世是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盛世也是最有利于实现自我价值的时代。历史系汤纲说:“躬逢盛世,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贯彻,为我们更好地面对历史真实创造了条件。”管理学院华宏鸣认为:“‘老有所为’能满足老同志受到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从生命的价值意义看,它对我们学校的退休教授来说尤其重要。”他2000年退休后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主编出版了《组织与管理题苑》,发表论文七篇,在国际会议上宣读发表论文三篇。《21